

专题栏目: 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

# 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双向度变革研究

刘立云<sup>1</sup>, 孔祥利<sup>2</sup>

(1.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文化与历史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5;

2. 陕西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生产方式。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命题, 是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同时, 必须全面深化改革, 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对此, 需要更加准确践行“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使命要求,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全面科学地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与实现, 既表现为新质生产力方面技术进步、产业升级、要素配置的革命性意义, 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生产方式新变革、社会关系新特征的决定性作用; 又反映出新型生产关系方面“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基本经济制度三个层面的时代内涵, 以及其有助于新质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的反作用。所以, 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双向度变革, 一方面是以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发展, 通过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重塑现代化产业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实现; 另一方面则是以改革为动力的新型生产关系构建, 通过新型生产关系最集中体现的基本经济制度、科研评价体系与人才培养机制等实现。由此, 推进新时代社会生产方式系统性、综合性的改善与优化。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新型生产关系; 生产方式; 双向度变革

**中图分类号:** F014.1; F1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454(2024)0X-0000-11

**引用格式:** 付星吉, 白利鹏. 资本有序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识及其实践进路[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4, 37(X): 00-00.

**Citation Form:** LIU Liyun, KONG Xiangli. A bidirectional study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J]. Journal of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4, 37(X): 00-00.

从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概念<sup>[1]</sup>, 到 12 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发展新质生产力”, 再到 2024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系统阐述, 以及 3 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团组三次谈及“新质生产力”并进一步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不断理论化、系统化和具体化。同时,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发展新质生产力, 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就启示我们要全面研究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从二者结合的生产方式全景式变革的视角, 阐释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命题, 为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 新质生产力一经提出, 就引起了学界的广泛热议。事实上, “新质生产

**收稿日期:** 2024-01-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坚持中国道路的经验研究”(22ZDA013);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重大项目“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原创性贡献”(2022ZYRZ02)

**作者简介:** 刘立云(1976—), 女, 甘肃武威人,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与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博士后, 陕西省《资本论》研究会副秘书长, 研究方向为国民经济学; 孔祥利(1963—), 男, 陕西宝鸡人,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及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陕西省《资本论》研究会会长,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力”在我国有较为深厚的理论基础,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与意义。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以平心为代表的学者对生产力理论进行讨论,认为生产力的物质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矛盾是推动生产力自行增殖的动力。20世纪80年代熊映梧《生产力经济概论》《生产力经济学原理》等著作作为生产力经济学的突出代表,认为“忽视生产力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致命弱点”。20世纪90年代,胡瑞梁《关于劳动、所有制和等价物交换的一些理论问题——林子力同志的〈论新型等价交换〉读后感》<sup>[2]</sup>、纪辛《论新型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构建》<sup>[3]</sup>等的发表,说明学界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讨论一直方兴未艾。21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纵深推进,新的生产力理论与新型生产关系形成,要求学界不断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阐释,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学者们主要观点如下。

一方面是关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内涵特征与理论机理。李政等认为新质生产力表达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逻辑<sup>[4]</sup>;曾立等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源于突破西方科技霸权、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的变化、生产力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和生产模式更新迭代的需要<sup>[5]</sup>;能够促使中国经济逐步从要素投入型向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型增长模式转型<sup>[6]</sup>,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效率和质量变革<sup>[7]</sup>,并将对新时代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产生重要影响<sup>[8]</sup>。就其内涵特征而言,简新华等认为新质生产力代表新型的高水平生产力<sup>[9]</sup>;蒋永穆等分析其具有科技创新、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大内涵特征<sup>[10]</sup>;呈现出“创新驱动”与“质量牵引”以及二者协同演化的生产力发展新模式<sup>[11]</sup>、“二向三元四维”的解释框架<sup>[12]</sup>或“生产要素—组织形态—产业体系—技术创新”四个维度的逻辑递进<sup>[13]</sup>。翟青等认为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了马克思生产力质量理论、生产力发展理论和生产力进步理论<sup>[14]</sup>;陈雨露等强调数字技术促进了实体经济效率提升及经济增长<sup>[15-16]</sup>;黄少安阐明了无论是“数字化技术”还是“数据”的价值和价格决定,仍然可以运用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理论加以解释<sup>[17]</sup>。

另一方面则是关于新质生产力实践路径与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程恩富等认为新质生产力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发展与创新<sup>[18]</sup>;高帆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分析框架<sup>[19]</sup>。特别是,有学者认为需要塑造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sup>[20-21]</sup>。为此,魏崇辉主张政府与市场应该协同发力<sup>[22]</sup>;沈坤荣等指出以新技术加速生产方式变革、以新动能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以新质能提升经济发展质量<sup>[23]</sup>;洪银兴强调要发展新产业<sup>[24]</sup>;卢建军坚持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力<sup>[25]</sup>;石建勋等提出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科技创新体制和制度环境等新型生产关系<sup>[26]</sup>,从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sup>[27]</sup>,为传统生产力跃升提供中国方案<sup>[28]</sup>。

上述研究成果,反映出学界目前已基本形成有关新质生产力研究的逻辑认识、理论阐释与价值概括。但是,基于新时代问题导向的、紧扣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的系统性整体化分析,研究的学理深度仍有待进一步深入。且新质生产力的实现路径略显单一,较少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结合的生产方式全景式变革的视角,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命题,难免会产生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对基本经济制度、体制机制、经济利益调整、劳动关系等方面研究的忽视。据此,笔者认为:(1)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生产方式,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传统定义。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属于生产的自然属性;生产关系则是它的社会形式,属于生产的社会属性。只有分别从自然、社会属性两方面综合考察,联系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来研究新时代生产方式,才能科学全面地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2)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上,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探索新时代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便增进社会财富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3)新质生产力的数字化价值生产过程并没有完全脱离以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石的价值生产过程的一般规律,但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生成了不同于工业经济时代的特殊性,需要与时俱进地提供可以有效解决更多现实问题的方案。因此,为了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更全面科学地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与实现,笔者拟基于“两个大局”历史交汇的时代背景,厘清新质生产力的革命性意义与决定性作用;揭示新型生产关系的时代内涵与反作用;结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提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探索实现二者双向度变革的有效路径。

## 二、新质生产力的革命性意义与决定性作用

### (一)新质生产力的革命性意义

#### 1. 技术革命的迭代突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表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生产过程,才表明人类所有创造性活动的发生。马克思指出:“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sup>[29]376</sup>纵观人类发展史,生产力的每一次飞跃都伴随着技术革命迭代取得突破性进展。近代以来,世界发生了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是工业革命的机械化,促进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的转型;第二次是工业革命的电气化,世界经济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第三次是工业革命的信息化,有力推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第四次是工业革命的数字化,基于人工智能、5G、大数据、基因编译、量子技术等各形态的前沿科技革命正在逐步转化为生产力,生产方式变化引发一系列生产关系的新变革。

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历经四次科技革命,跨越蒸汽机时代、电气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来到“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新质生产力时代。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具有颠覆性创新驱动、发展速度快、发展质量高等特点,是以智能技术和绿色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引致的生产力跃迁。具体而言,“新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掌握了科学技术、具有创新能力和数字素养的拔尖创新人才与专业技能的新型劳动主体;二是拥有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的新型装备制造业与新型生产资料;三是具有绿色、环保、可持续的新材料、新能源、新资源以及存在于非可视空间的数字资源等新型劳动对象;四是具有重大引领、体现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五是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管理,以及更高端的先进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管理技术等。总之,当代社会生产力的新变革意味着知识、智力、数据等新要素作为科技创新的核心资源,科技创新及其基础性研究的重要性、先导性越来越突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将由健康、智能、绿色三大主导技术群共同融合支撑而非单一主导技术牵引,所引发的技术进步促使未来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

#### 2. 产业的转型升级

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面临着发展、改革、安全、稳定的多重任务。对标新时代发展要求,包含更高水平的质与量的统一,即经济发展规模与速度、劳动生产率水平、科技运用的广度与效能、经济结构的层次和质量等,重点在于质量效率、结构优化和创新动力,均建立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上。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数量日益增加。2022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13%。2023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总数已突破200万个。科技革命已经深入渗透到国民经济社会生活。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价值链不断延长。衍生出来的产业链条越来越长,附加值越来越高。由科技创新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成为新质生产力重要载体,将具有强大的战略引领力、无限的发展潜力及显著的竞争优势,以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支撑,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重塑区域发展新格局。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将覆盖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以及从“未来产业”至“战略性新兴产业”再至“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等产业生命周期依次递进迭代的新兴产业优化升级所有体系,引发产业体系的变革,进而对知识与技术体系产生颠覆性影响,对产业结构、生产与组织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对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导致已有技术群的演进、迭代、融合改变产业的面貌,形成“产业的未来”;或者技术轨道的变化甚至是“技术制度”的变化推动技术的变革,形成“未来的产业”。为此,需要在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找到“根技术”,控制“根产业”,积极寻求为解决科技、经济、社会难题提供新技术新工具,牢牢把握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潜在方向。

#### 3. 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意味着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下,对生产力各要素及要素之间的组合有更高更新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我们认识生产要素的配置提供了理论指导:既重视劳动主体作为“最活跃、最能动、最革命因此也是最重要的因素”的能动性与创造力,注重劳动者本身蕴含的智能内容;又重视劳动资料随社会发展的不断更新;也重视劳动对象克服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断裂”而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直接经济思想来源是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研



究生产力发展、劳动价值与资源配置问题时,吸收借鉴了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的古典经济学理论。进入20世纪以来,赫克歇尔与俄林(1933)、里昂惕夫(1953)、巴拉萨(1966)、劳埃德和格鲁贝尔(1975)、克鲁格曼(1979)、凯克斯基和福尔威(1987)、赫尔普曼和弗洛姆(2001)等都对财富生产、商品交换和资源配置问题进行了理论解释。古典经济学以来三百多年世界经济的发展更多属于土地、劳动力、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要素的配置与驱动。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全球要素禀赋及经贸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分流,资本密集型中端制造产业的产业黏性正在加剧本土企业与国际市场的直接竞争。前三次工业革命时期,英美日生产力的跃迁主要依托传统制造业技术和工业经济形态,第四次工业革命则更多倚靠新兴科学技术和数字经济形态。即,技术内容由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变为智能化,技术动力由热力变为算力,主动要素由资本变为数据,要素组合由函数变为算法,产业形态由垄断变为生态系统,劳资关系由资本雇佣劳动变为劳动独立和虚拟空间潜在控制并存。因此,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塑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其决定性力量是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中国将在经济全球化与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形成可持续增长模式,解决要素配置、福利改善和资源供给的有效途径,“通过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sup>[30]94</sup>。

## (二)新质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

### 1. 技术革命迭代突破决定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科学技术属于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工业的发展带来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强调科技革命及其应用对于提高生产效率与增进社会福利的影响。比如“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sup>[31]100</sup>。明确“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sup>[32]188</sup>,且“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sup>[33]664</sup>,“(大工业的发展)产生了空前大规模的资本和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这些生产力的手段”<sup>[34]303</sup>,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放和扩容了生产资料。恩格斯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sup>[34]1003,684</sup>,科学已成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sup>[35]570</sup>。生产力的基本要素除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以外,科学技术、管理等要素也在生产过程中作用突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资本循环理论分析范式“ $G-W(A+Pm)\cdots P\cdots W'(W+w)-G'(G+g)$ ”中,揭示了产业资本的价值运动规律。产业资本时空并存的连续性本身就是一种劳动生产力。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先后经历的科技革命,在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引起了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以及相对过剩人口的出现。尽管资本积累促进了财富在资本一极的增长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但资本主义私有制却限制了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随着资产阶级在自身范围内的资本积累,以及先进生产力的不断孕育,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必将日益突出。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是经济社会形态阶段性演变的基础。生产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每个时代都有引领时代潮流的新质生产力;一个经济体能否把握时代发展带来的新发展要素并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与该经济体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关;只有当经济体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之后,原先的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的减弱以及发展动力变化,经济发展的重心才开始从后发追赶逐渐向前沿发展竞争转移,技术革命迭代突破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才真正凸显出来。面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包括发展要素、发展环境、发展问题、发展动力、发展任务、发展重心等,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在中高收入阶段经济发展重心转移之后的新要求、新方向和新理念,在理论上具有发展经济学意义,在实践上具有一般性的世界意义。体现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转型,通过自主创新,在没有后发优势的地方创造竞争优势,在没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在与发达国家竞争中,实现产业结构变迁升级,形成世界范围内的新二元经济格局,进而改变生产结构、生产结构、就业结构和收入结构。

### 2. 现代产业体系重塑决定的生产方式新变革

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社会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sup>[36]210</sup>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物质资料生产及其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核心问题。社会化扩大再生产要求的两大部类间  $I(v+\Delta v+m/x)=II(c+\Delta c)$ ,以及各自实现的  $I(c+v+m)=I(c+\Delta c)+II(c+\Delta c)$ 、 $II(c+v+m)=I(v+\Delta v+m/x)+II(v+\Delta v+m/x)$ ,反映了生产资料生产部类与生活资料生产部类内部与相互之间的衔接互补关系,说明人们的生产与消费的转换、衔接、流通。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人民的消费就要由追求消费数量转向消费质量。高品质生活的消费升级,意味着更关注消费品质、消费档次、消费品牌。而一切消费源于生产,作为新质生产力结构特征载体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就起到国民经济“源头活水”的关键性作用。

从产业层面来看,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传统产业焕新、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加快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通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以此来完善我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根据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科技部、国家能源局、国家标准委印发《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2023—2035年)》,我国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民用航空、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等八大类;未来产业包括元宇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未来显示、未来网络、新型储能等九大领域。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不断壮大,企业总数已在2023年9月突破200万家。同时,“新三样”产品销量迅速增长,产品出口超万亿元,增长近30%。当前,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技术进步快,但不少领域仍与国际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我们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指明了方向,说明需要做好新旧发展模式和动能之间的衔接和切换,短期落实、中期谋划、长期布局,避免未立先破、破而不立。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放弃传统产业,传统产业也不代表落后生产力。传统产业在我国制造业中占比超过80%,是国民经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因为产业不是静态的、停滞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今天的“支柱产业”也许是昨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天的“未来产业”,应该贯彻传统产业“脱胎换骨”、新兴产业“强筋壮骨”的发展战略。

### 3. 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决定的社会关系新特征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sup>[36]59,210</sup>“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sup>[29]1000</sup>。生产力作为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包含劳动者、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要素”,即劳动者个人能力、自然条件和劳动的社会力,又被分为劳动者的主体因素和生产资料的客体因素两大类。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背景下分析了活劳动在机器体系中的价值创造过程,主要三方面:劳动过程中的单个劳动和直接劳动转变为集体劳动和社会化劳动;机器生产通过对补充劳动力的占有、延长工作日、强化劳动来增加活劳动的剩余价值创造;劳动组织形式变革为工厂制度,通过机器体系对劳动的异化实现资本对工人的专制。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单纯聚焦“平均熟练程度和平均劳动强度下生产单位使用价值所耗费的”同质化劳动价值的及时实现。

但是,需要注意两点。一是被社会认可的劳动具有量化边界。随着初始阶段劳动力的单位增加带来的价值的增殖,使不同行业利润率不断增加;随着劳动力的单位增加带来的部门之间的竞争,使社会的平均利润率形成;后续阶段继续增加劳动力投入带来的劳动力成本增加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利润率下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所揭示的利润率下降规律,正是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在生产资料相对有限及劳动者素质保持静态的条件下,多劳未必会增加社会总收益,这就说明了当劳动力市场总体供过于求,大量低劳动力资本的供给将导致单位劳动效率降低从而呈现劳动报酬不断下降的趋势。二是等量劳动所创造的收益由于拥有生产资料的质量不同而产生差异。需要将劳动资本价值和劳动者贡献相结合,提高劳动收益。新质生产力的目标参照系是“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新质生产力的劳动效率提高,与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有很大不同。过去是对体力劳动即直接生产劳动的替代,现在主要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进步对非创造性、非创新性的脑力劳动的取代。科学技术、管理水平、信息、数据、算力等都被纳入了生产力的全要素之中。这意味着高水平智能化生产条件下,企业要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就难以通过加强劳动控制,压榨剩余劳动来实现,只能依靠技术创新和优化,而这也是创造性劳动的产物。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2019)就提出,企业是高效生产知识的组织<sup>[37]</sup>。并且这不是纯粹的技术过程,也嵌入到劳资博弈过程中。拉佐尼

克(2007)认为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劳资合作可以获得更高的成功概率和生产效率<sup>[38]</sup>。当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生产方式下企业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的方式是基于创造性、创新性劳动时,愿景引导型企业行为模式将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企业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员工持股”,劳资关系大为缓和,收入分配也更加均衡。此时,可以认为在企业内部,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适应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在特定条件下形成了企业内部的新型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价值生产过程并没有完全脱离以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石的价值生产过程的一般规律。

### 三、新型生产关系的时代内涵与反作用

#### (一)新型生产关系的时代内涵

##### 1. 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有机整体考察新型生产关系

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既是发展命题,也是改命题。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物质资料生产不仅是个体劳动者孤立的生产,而是在社会进行的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sup>[39]724</sup>说明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狭义的生产关系仅指直接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广义的生产关系是指社会化再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关系,联系不断的社会生产从纵向看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sup>[32]23</sup>。一方面生产和消费、分配、交换具有直接的同一性,直接互为对方。另一方面生产和消费、分配、交换会相互作用,即生产决定消费、分配、交换,消费、分配、交换反作用于生产。

因此,随着劳动过程从物理空间转向数字空间,劳动组织、劳动方式和劳动产品等随之改变,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升,数据及其“算法”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渗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成为产业结构优化、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先进工具。发展新质生产力,就要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型生产关系,形成可转化为先进生产力的制度、体制和政策。新型生产关系“新”的生产端体现在鼓励新科技、培育壮大新型产业、采用新型能源。由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科技创新打底;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布局规划未来产业,创建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发展新型储能”“促进绿电使用和国际互认”,培育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以年均更低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更高的经济增长。“新”的分配端体现在资源要素的分配与产品福利的分配。坚持所有参与生产活动的要素均在初次分配中得以计酬,尤其是激励新质生产要素作用的发挥,规避多重隐性剩余价值生产,及时补偿可能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利润流失部分;体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本质要求,促进新时代发展成果共享。“新”的交换端体现在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叠加地缘政治趋紧因素,提升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水平,运用以攻为守的必要战略配置,与“以进促稳”的内在逻辑高度一致;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既要依靠核心技术提高产品附加值、创新营销模式、走出低价竞争模式,又要通过一系列高水平开放政策、促进经济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新”的消费端体现在培育壮大新型消费。高质量发展更强调“含绿量”,“碳足迹”与绿色消费、绿色供应链、全球气候治理等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资源承载能力、生态环境容量作为乡村旅游链发展的重要条件,将实施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促进政策;更加注重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数字化、智能化、场景体验化的新型互动,开发新的全民衣食住行消费增长点,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

##### 2. 从基本经济制度三个层面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有机整体考察新型生产关系

从生产关系的三方面内容看,还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地位,以及收入分配的方式。马克思深刻考察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揭示出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及运动规律,科学地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劳动与资本、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对立生产关系,导致“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sup>[40]279</sup>。从根源上讲,只有建立



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共同主人的新型生产关系,才能真正实现劳资平等。所以,“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的社会可以更大踏步地前进。这个社会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生产者,他们懂得整个工业生产的科学基础,而且每一个人对生产部门的整个系列从头到尾都有实际体验,所以这样的社会将创造新的生产力”<sup>[34]684</sup>。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是一种更为先进的生产关系,具有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制度优势。随着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要素协同和人与人之间利益分配方式、劳动与生产的组织形态等也在发生深刻的创新与变革。新质生产力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全要素生产力提升决定了新型生产关系一定是适应科技创新活动发展、明晰各参与创新的主体的责任和权利及其相互地位、完善不同要素持有者利益分配机制的生产关系,这种新型生产关系能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强劲的助推动力和充足的成长空间。

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新质生产力的制度基础。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使诸多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日益具有某种社会公共产品属性,生产资料使用权和所有权形式上的社会化成为未来趋势,促使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发生根本性变革。数字技术在人类生产生活生存中的广泛应用,决定了新型生产资料的共享性与传统生产资料的排他性形成显著区别之一;越来越多的公众和机构等投资者通过多种方式持有相关企业的股份,新质生产力催生的新兴产业投资回报率高于传统产业投资回报率形成显著区别之二,这也使得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朝着混合所有制和社会所有制方向发展。二是以“按劳分配为主、承认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特别是建立要素市场化基础上按要素的市场贡献参与分配”。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涉及诸多重要的国计民生领域,需要规模巨大的资金、技术、人员、政策等长周期持续性投入。从分配关系来看,与传统生产力时期主要采用的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方式不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带动了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创意、信息、数据、算力等多要素参与生产与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方式较以往更加多样,人们的报酬获取途径更加多元,占有不同生产要素者甚至可以拥有相对应的更多要素收益,将极大调动社会最广大层面的劳动者积极性,充分发掘社会生产资料及劳动对象开发拓展潜力。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是目前最能激发劳动者活力,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安排。从人与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和关系来看,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的发展赋予劳动本身极高的自由度和可选择性,出现“技术—劳动过程”和“去技术—劳动过程”并存的时空重叠下数字技术型劳动者和数字一般劳动者,数智化的生产方式逐渐显现出了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性、灵活性和创造性,新的劳动组织形式以数字平台的形式出现,发展出正式受雇于平台企业的数字劳动者和零工经济、外包经济、虚拟参与等诸多非正式雇佣数字劳动者,区别于传统劳动过程中人与人的管理和服从关系特征,更加强调新型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企业内部逐步采用柔性的员工管理模式代替传统的刚性管理模式,劳动协作和分工的协同化、网络化和情感交互特征越发明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趋向于共生合作。这将促进物质财富更多地用于激发人的智慧和创造力,推动科技与人文的深度融合创新。同时,基于数智治理的政府宏观精准调控与市场微观主体的自组织之间的协调也将成为可能。这种新的经济模式将更加注重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的协调平衡,形成平稳持续的驱动方式和机制,并建立相应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与方式。

## (二)新型生产关系的反作用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也反作用于生产力。列宁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sup>[41]110</sup>。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总体上是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自觉调整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生动例证。进入新时代,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2012年的54万亿元跃升到2023年的126万亿元,翻了一番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6300美元上升到12700美元,稳居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增速上,无论是2013至2023年年均6%以上的增速,还是疫情三年年均4.5%的增速,均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位于前列。而且,2023年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我国经济总体回升向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6万亿元,经济增长5.2%,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引擎。反映出新时代的社会生产关系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而且,新型生产关系也有助于新质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一是数据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共属性促进了生产力社会化程度。当数据作为生产要素,鉴于数据的虚拟性、无限性、收益递增性,数据信息的生产过程与数据增殖的生产过程往往容易引发可能的问题,产生数据垄断的生产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数字鸿沟的区域极化效应以及劳动报酬的收入极化效应,数据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共属性可以突破资本主义生产资料被私人占有的盈利属性,建立数据信息的开放共享机制,保障信息对称,提高数据资源的使用效率、时空路径与交往模式,真正促进社会发展进步与人类文明共享。二是平台经济的社会主义公共属性提升了生产要素的精准匹配。平台基于数字技术有效整合并盘活了社会闲置资源,以“云端制”的社会化生产组织形式,衍生出“大平台+小前端”的“原型结构”发展模板,产生新的劳动合作组织模式。不同劳动者在平台的统一信息连接与资源调配下,销售、存储、运输各环节相互衔接形成劳动合作关系,有效助推商品本身完成“惊险的跳跃”。其中平台对劳动的全方位数字记录可以促进社会生产资料的有效配置、生产改进、精准计酬,有效化解劳资纠纷,真正体现劳动分配公平正义与人的全面发展。当然,针对数字化生产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数字资本的垄断、数字经济下的劳资关系及收入鸿沟等,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将涉及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的数字平台所有权收归国有,根据不同经济体的实际状况,选择国有国营或国有民营,国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对于现有数字平台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逐步实现国有控股。

#### 四、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双向度变革

新质生产力不仅涉及技术革新、生产要素的创新组合及其效率提升,而且涉及与经济组织的变革、经济系统的优化、经济体制的完善所对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sup>[42][12]</sup>。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体现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矛盾统一的观点。因此,理解新质生产力要借助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方式,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体系,具体实现路径是双向度的,包括形成新质生产力与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两个大的方面。

##### (一)以创新为核心,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1. 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实施着力扩大有效需求的“有潜能的消费”与脱虚向实巩固壮大实体经济的“有效益的投资”相结合战略,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取得新突破。其一,加快构建完整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力提速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突破。深化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创新用好“先使用后付费”“权益让渡”“先投后股”等方式,以便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提升新质生产力竞争力、优化创新生态、实施打造人才新高地战略、加强金融创新、推进协同创新,加快构建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与发展模式,最大限度地实现创新资源整合优势、协同创新团体优势、技术攻关体系优势。其二,推进本土企业参与制定国家标准,实现国际国内标准互认,以标准引导企业自主创新过程;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进行产业的高端切入,依托高端技术布局以我为主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通过创新驱动实现动能转换;客观认识自身产业弹性、比较优势,打造产业结构调整的高端平台,对处于高端环节的技术干中学,从而掌握中高端环节的核心技术,深度参与全球的技术开发和应用。

2. 重塑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制造业为本、实体经济为重,实施传统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集聚发展。其一,坚持链式布局与集群化发展,聚焦重点领域,做强做优先进制造业集群,实施产业集群跃迁工程、领航型企业培育升级工程、产业集群“N+1”联动提升工程,提升产业集群化发展能级。加快数字产业、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碳中和等未来产业发展,推进新兴产业跨界融合。通过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实融合,强化数据资源使用保障,让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促进“大数据+”基础资源优势转化为“数据要素×”经济发展新优势,推动数据在“5G+工业互联网”典型应用场景中发挥乘数效应,为我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其二,从“区域创新平台—新兴产业集群—新兴产业生态”予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区域布局;推动国内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创新与联合攻关,强化对于创新资源的磁吸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基



础高级化与产业链现代化,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引擎;进行前瞻技术布局,建立我国“十四五”时期长板产业,形成与国外领先国家和跨国企业的战略互卡,实现传统产业老树新花,新兴产业竞相发展,未来产业孕育孵化。

3.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应对动能转换、资源限制、环境约束、区域壁垒等各种矛盾,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其一,从生产要素流动内容,推动劳动力要素的城乡、区域、内外循环;推动土地要素在市场化配置下的循环流转;推动资本要素盘活存量、增长流量;推动技术要素的创新更迭。其二,在生产要素流动地域,西部地区借助资源禀赋充裕优势,适宜进行绿色能源的开发利用,培育壮大新能源产业集群,推动能源结构转型优化;东北地区借助工业体系完备优势,适宜进行以科技创新推动传统重工业升级改造,培育新增长动能;中东部地区借助科研人才优势,适宜进行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高精尖产业领域。

## (二)以改革为动力,加快构建新型生产关系

1. 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多元产权主体与所有制结构。建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实现关键技术领域的追赶甚至换道超车。其一,增强科技创新机制政策的所有制阶段性衔接与统筹,健全法规政策环境。优化国有资本重点投向和领域,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推动数智化同各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新兴战略产业与未来产业。在国家层面建立统一的产业发展战略规划,持续对国有企业承担的长周期、高投入、垄断性强的涉及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安全、人民健康的重要战略性领域的“卡脖子”技术予以资助;增加国产产品采购机构的激励政策,给予长期低息贷款;建立购买国产产品资金返回机制,作为用研联合基金。其二,充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包括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企业)在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农业劳动力转移、国际市场开拓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互为主体,而且民营经济拥有中国80%的科技创新,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破除企业所有制属性壁垒;设置“中小企业技术转移资助项目”,由企业根据任务导向自主决定技术投入,用于重大科研成果商业化;加大科技成果转化税收优惠,推动中小企业能够以优惠利率获得信用贷款;兼顾不同规模企业的需求,分类引导大中小微企业“智改数转”,做好技术、方案、资金、人才等方面的支持工作。推进本土企业参与制定国家标准,实现国际国内标准互认,以标准引导企业自主创新过程;促进中外经济技术合作,启动国外企业收购我国中外合资企业的合规性与安全性检查机制,设立国有基金对关键技术领域企业收购实施防御性保护。

2. 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分配关系。其一,健全所有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由市场评价贡献计酬机制,激发生产要素活力,做好按资本、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管理要素以及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初次分配,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加快形成科技创新人才的收入激励机制,切实保障数字产业与新业态从业者的收入,增强我国劳动者内生发展动力与创新创业能力。其二,构建多元主体合作模式,统筹整合中央、地方、国家实验室、科研院所、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等多方力量,建立利益分享与风险分担机制,鼓励交叉学科研究和团队跨领域合作,确保国家整体利益最大化。采用灵活的人才流动机制和项目组织方式,实施更加灵活和包容的人才政策、更加开放的人才专项与柔性人才引进政策,充分发挥科研人员创新潜力;优化提升研发创新平台、产业创新平台、专业服务平台,布局组建产学研用联合体,加快形成高层次人才与高技能产业工人的链式效应。

3. 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以“供需平衡”为核心的市场政策机制,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市场体系、宏观调控、财税金融、风险防范、世界市场配置及营商环境培育等方面,促使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不断完善现代化经济新体制的顶层设计。其一,构建全国统一高标准市场体系,深化各项改革,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围绕新型生产要素构建和完善充分流动、高效配置的市场经济机制体系,实现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和领域顺畅流动;依法加强金融与金融业监管、数据化和数据管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建立重大科技安全事件应急处理机制,深入研究国际规则,及时形成动态治理结构,用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继续向全面深化改革要发展动力。其二,推进传统要素与新兴要素的世界市场配置;加快破解制约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深层次问题,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促成全球经济循环体系更加顺畅有序。打

造新时代全球科技和产业革命孕育的贸易版图重构与市场结构重塑,拓展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内涵和外延。

4. 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时代科研评价体系与人才培养机制。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把经济增长的动力真正转移到创新驱动上,推进创新攻关的“揭榜挂帅”体制机制,营造创新进取包容的科研氛围,提供组织机制保障。其一,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战略,构建企业主导的以新质生产力为靶向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体系;探索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加快培养储备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和急需人才;加快转变人才管理职能和办法,向用人主体放权,使各方面人才各得其所、各尽所能、各展其长。抓紧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积极谋划落实包括“创新吸引和集聚世界优秀人才的体制机制”“健全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全链条培养使用体系”“为外籍人才提供出入境和停居留便利”等配套举措。其二,建立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流动的科学合理的工作机制,优化高等学校与职业技术院校的学科设置和未来人才培养模式,保障所有要素参与规范化的收入分配过程,完善知识、技术、人才的产权保护,深度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全面推动工业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四化”发展,实现实体性与非实体性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智力支撑。

### 参考文献

- [1]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N]. 人民日报,2023-11-24(9).
- [2] 胡瑞梁. 关于劳动、所有制和等价物交换的一些理论问题:林子力同志的《论新型等价交换》读后感[J]. 经济研究,1989(1):34-47.
- [3] 纪辛.《论新型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构建》介绍[J]. 经济学动态,1992(9):73-75.
- [4] 李政,廖晓东.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历史和现实“三重”逻辑[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6):146-159.
- [5] 曾立,谢鹏俊.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出场语境、功能定位与实践进路[J]. 经济纵横,2023(12):29-37.
- [6] 杨汝岱,李艳,孟珊珊. 企业数字化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与产业链溢出效应[J]. 经济研究,2023(11):44-61.
- [7] 周文,许凌云. 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 改革,2023(10):1-13.
- [8] 赵峰,季雷. 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构成要素和制度保障机制[J]. 学习与探索,2024(1):92-101, +175.
- [9] 简新华,聂长飞. 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及其作用发挥: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解读[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6):29-36.
- [10] 蒋永穆,乔张媛. 新质生产力:逻辑、内涵及路径[J]. 社会科学研究,2024(1):10-18, +211.
- [11] 钞小静,王清. 新质生产力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路径[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1):12-20.
- [12] 张文武,张为付.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理论逻辑、主体架构与实现路径[J]. 南京社会科学,2024(1):56-64.
- [13] 杜传忠,疏爽,李泽浩. 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与实现路径[J]. 经济纵横,2023(12):20-28.
- [14] 翟青,曹守新. 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阐释[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2):15-22.
- [15] 陈雨露.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理论探索[J]. 经济研究,2023(9):22-30.
- [16] 翟绪权,夏鑫雨. 数字经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机制构成与实践路径[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44-55, +168.
- [17] 黄少安. 关于“数字化经济”的基本理论[J]. 经济学动态,2023(3):3-20.
- [18] 程恩富,陈健. 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J]. 当代经济研究,2023(12):14-23.
- [19] 高帆.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6):127-145.
- [20] 金观平. 深化改革形成新型生产关系[N]. 经济日报,2024-2-12(01).
- [21] 茶洪旺. 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N]. 中国经济时报,2024-3-19(2).
- [22] 魏崇辉. 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意涵、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J]. 理论与改革,2023(6):25-38.
- [23] 沈坤荣,金童谣,赵倩.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J]. 南京社会科学,2024(1):37-42.
- [24] 洪银兴. 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J]. 当代经济研究,2024(2):7-9.
- [25] 卢建军. 发挥研究型大学作用,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N]. 各界导报,2024:3-7(4).
- [26] 石建勋,徐玲.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战略意义及实现路径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2024(1):3-12.
- [27] 孟繁哲. 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N]. 人民日报,2024-3-15(5).
- [28] 蒲清平,黄媛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理论创新与时代价值[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23(6):1-11.

- [2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0]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3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3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7] 野中郁次郎,竹内弘高.创造知识的企业:领先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M].吴庆海,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9.
- [38] 拉佐尼克.车间的竞争优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3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0]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41] 列宁.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4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A Bidirectional Study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LIU Liyun<sup>1</sup>, KONG Xiangli<sup>2</sup>

(1. Institute of Culture and History, Shaan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Xi'an 710065, China;

2.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The sum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constitutes the social mode of production.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t productivity theory, a strong driving force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an internal requirement for achiev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 and form a new typ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hip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it.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more accurately practice the mission requirements of “promoting the chemical and physical chemistry of the Party’s innovative theoretical system”, comprehensively and scientifically grasp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realiz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the contradiction movement between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This is manifested in the r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factor allocation i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decisive role in the new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new changes in production methods, and new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relations; It also reflects the contemporary connotation of the four links of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exchange consumption” and the three levels of basic economic system in the new typ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which has a counter effect on further liberating and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o, the bidirectional transformation betw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is, on the one h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with innovation as the core, achieved by enhancing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bility of enterprises, reshaping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s, and improving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typ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hip driven by reform, which is achieved through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scientific research evaluation system, and talent cultivation mechanism that are most concentrated in the new typ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hip.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production methods; bidirectional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马红鸽)